

国际关系理论的人性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00(2008)04-0079-02

中国崛起是否会推动中国学派的诞生,学界颇有争议。其实不管如何回答,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为何很少探讨印度的崛起是否会推动印度学派的诞生?其他“金砖四国(BRICs)”呢?究其实质,中国学派的提法,仍然从国家层面感悟到时代的变化。全球化表面上是权力上移(即以超国家形式推进),其实是越来越下移(即回归人的层面)。换言之,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正在从器物层面——主要是货物、货币的自由流通,制度层面——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制的传播,发展到观念和人的层面,并集中体现出文化内涵来。

在以人和观念的自由流动所揭幕的全球化新阶段,世界面临着认同危机。民主过度、民主赤字和民主不足,为不少地方的政局动荡所佐证。恐怖主义、文明冲突和民主同盟的滥觞,折射的是文化与观念的麻烦。人口的力量正在超越国家的力量;西方人早于西方国家感受到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为此,建立在西方空间逻辑及其承载的理性思维,愈发难以诠释世界的多样性图景。反全球化运动主要在西方而不是非西方崛起的事实表明,西方社会日益走向保守,甚至走向自由、平等、博爱的对立面,或者说将其局限于西方人内部,对于自由移民、平等对待非法移民、援助欠发达国家和国内欠发达人口,要么很不情愿。

从人的角度说,参与全球分工的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决定一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未来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国际政治日益地区化、个性化,正在从国家间政治转变为人的政治;人的因素最终定义全球化的结局。回归人的政治,实现从理性到感性、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转变,这是全球化发展到人的阶段给我们的新启示。

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演进史,其理论五彩缤纷,然而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三大范式:回归古典、回归现实和回归自然,对应了国际研究的三大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自身维度。所谓回归古典,主要是回归古希腊、古罗马或文艺复兴等时期历史上的西方经典概念、经典问题和经典理念,如“民主和平论”对康德“永久和平”思想的继承;所谓回归现实,是对现实世界变量的补充,如“软实力”理论对信息时代的把握;所谓回归自然,是还原西方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概念,还原理论作为文化的本质,这是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所忽视的。

以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为标志,西方的冷战“红利”已经用完。如今,新一轮全球化竞争已经到来,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在递减,发展中国家由于后发优势与人口红利,从资本、技术和制度的全球扩散中受益更多,而西方发达国家承担全球化的代价更大,两者相比,使西方在全球化中逐渐从攻势走向守势,甚至出现了西方反对西方的现象,即现在的西方人反对过去西方人所推崇的自由贸易、开放社会等理念。于是,有人说我们进入了后全球化时代。西方模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再一次遭受重大挑战,文艺复兴红利也即将用罄;转向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源头,成为西方模式的救命稻草。然而,正如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下场所显示的,回归古典并不能解决西方世界未来的麻烦。

回归现实又如何?在全球化的起点——西方化的全球化阶段,西欧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形成民族国家,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后确立了主权平等概念,也就产生了“国际”概念——东方国家有“外国”概念而无“国际”概念,就是因为没有平等的意识和主权概念——因而以三十年战争后形成的威斯

特伐利亚体系为标志,西欧诸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国际关系实践、观念与理论的先行者。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直到一战和二战以后,才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随后又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为世界首强,西方的重心也从西欧移到了美国。西欧的国际关系实践之花在美国结果,于是有了国际关系理论。西欧前辈只能去感慨——“只有外交学,没有国际关系理论”(马丁·怀特语),因而西方国家长期垄断了国际关系理论。

然而,这种全球化只是以西方为圆心的全球资本主义化,其基本前提是西方始终处于技术、信仰和制度的中心,为国际体系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问题是,西方的全球化“红利”在递减,西方世界出现严重的分裂;并且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化从圆形(西方化)发展成为椭圆形(西方-非西方并行);世界不是平的,也不是圆的,而是椭圆的。相应的,国际关系从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线性进化论,转变为多元、非均衡发展的非线性阶段。于是,国家、国际、关系、理论……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产生了质的变化,正在丧失其西方性,而更多展示其多元性文化内涵来。

于是,国际关系理论正面临着被时代所超越的尴尬。西方学者的研究从过去关注“我的世界”转向“世界的我”,具体表现在从对世界和平的关注转向对地区与本土安全的考量,从对全球化的乐观描绘(如“历史终结论”)转向对全球性问题的忧虑,“民主和平论”蜕变为“资本主义和平论”及“资本扼杀和平论”。

这样,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批判不只是简单的去美国(西方)化和实现中国化问题,而是反观国际关系理论自身,思考其先天不足与终极趋向,以呼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正本清源与返璞归真,即国际关系回归自然、自在状态,彻底超越“自我实现的预言”。

何谓回归自然?人是万物的尺度,国际关系也不例外;国际关系并非只是国家间关系或跨国关系,更是人的关系。然而,西方在人类历史上率先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历程中将自己视为目的而将他者视为手段,其国际关系学因而忽视普世的人学而推崇体现强者意志的国家学,不断在远离国际关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本质。为纠偏这一

情形,笔者呼吁将国际关系学从西方视其为国家理论的国际延伸或国家学说的国际抽象中解放出来,还原其本质——人学。国际关系学是人学在国际层面的体现。对国家的抽象不应以丧失人的主体性为代价。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一点并不因为上升至国际层面而有所改变,也不是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点缀人权或人道主义干预之类的幌子所能表达的。从本质上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吃人的理论——见国家不见人,以狭隘的国家的权力压抑广泛的人的权利。”

总之,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催生了超越国际关系的合理性——回归古典并非出路;全球化从圆形到椭圆形的演绎历程,提供了超越国际关系的合法性——回归现实忧虑;“吃人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质提供了超越国际关系的合目的性——回归自然成为唯一选择。笔者故此提出“超越国际关系”,即不仅超越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超越国际关系本身。超越的结果,是恢复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普遍性,一定程度上还原国家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本质(详见笔者新著《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世界知识出版社)。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命运是其社会科学属性的折射。西方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科学进行了历史梳理,发现其最主要概念来自于基督教,其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真理,而是文化。国际关系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也不是科学(真理),而是文化(人学),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一种近代延伸;而文化是多元的,人是多元的,是反对单向度进化论的。所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科学,只能是一种西方神话。

作为以人性超越国家性以及广义上超越国际关系的尝试,笔者近年致力于研究人口与国际关系,并坚信中国的崛起不只是带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式复兴——即所谓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也不只是还原基于文化多样性的多元世界的本质,更为实现“沉默的多数”(silence majority)权利,彰显占世界人口1/5乃至大多数人的意志。

[收稿日期:2007-10-31]

[修回日期:2008-02-18]

[责任编辑:谭秀英]